

文史杂谈

杜甫曾做“药农”

公元759年,杜甫由陇入蜀。他和妻子、儿女一道在浣花溪畔造茅屋,辟药圃,请友人觅求药苗。“药条药甲润青青,色过棕亭入草亭。苗满空山恣取誉,根居隙地怯成形。”为我们描绘了一派生机勃勃的药圃景象。

对于怎样种好药,杜甫也深有研究。在秦州(今甘肃),他见太平寺的泉水特别清冽,适合灌溉药圃,因而在《太平寺泉眼》诗中写道:“何当宅下流,余润通药圃。三春湿黄精,一食生毛羽。”

至于写采药、制药、卖药的诗就更多了。《秦州杂诗》中的“晒药能无妇,应门亦有儿”,反映了当时杜甫的妻子、儿子也参与精制药材了。另外,他还在诗中写道:“水槛温江口,茅堂石笋西。移船先主庙,洗药浣花溪。”这里的洗药,也是药物贮藏、炮制前的必要操作工序。

杜甫一生曾三次卖药行医。诗人35岁至44岁时,在长安未中科举,因此只好“卖药都市,寄食友朋”。第二次是杜甫携带家小由洛阳回华州(今陕西渭南市),这时的卖药生涯更苦了,到了“短衣数挽不掩胫”的境地。第三次卖药是在公元770年,杜甫摆药摊维持生计,直到这年冬天死在长沙到岳阳的小船上。马金材

红军长征途中如何粉碎舆论“围剿”

长征时期,国民党广泛散播关于红军的种种恐怖而荒唐的谣言,给长征中的红军造成不良影响。对此,红军将士用革命者的浩然正气捍卫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,粉碎了敌人的阴谋。

国民党实施舆论“围剿”

在长征途中,国民党一直搞所谓的“三分军事,七分政治”,企图在用武力“围剿”红军的同时,用谣言来孤立、打垮红军。

1935年1月,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建立“云南省宣传总队”,从昆明派往昭通镇雄县开展反动宣传。与此同时,云南镇雄县国民党政府还开始组建“县宣传大队”“区宣传中队”“乡宣传小队”,到处张贴反动标语,召集政府职员和学校学生召开大会,高呼反动口号招摇过市。一时间,从街道到学校,从《云南民国日报》到偏远乡村的围墙,到处是红军“红眉毛,绿眼睛”“见人就杀,见房子就烧”等种种荒谬、耸人听闻的谣言,使得群众人心惶惶。

国民党这种有组织的

造谣宣传不仅仅在云南开展,在贵州、四川等地也随处可见,比比皆是。1936年1月,红二、红六军团长征来到贵州石阡附近,各种谣言引得石阡附近群众纷纷四处躲避,村里四处无人,红军买不到粮食,伤员也没地方救治,十分困难。

“玩火者必自灼”

国民党散布谣言的伎俩一旦被群众识破,往往会更让人厌恶。

1936年4月,为围堵红军,国民党中央军进入云南镇雄县参加围堵,当地政府一再宣传“国民党军纪律严明”,要求群众“一致欢迎,毋庸惊恐”。然而,中央军到当地后,拉夫抢粮、抢劫强奸等事件层出不穷,穷苦人民惨遭蹂躏,其惨状罄竹难书,就连当时国民党地方官员都气愤不已,控诉“中央军四十七师,挨户驻扎,无论男女老幼一概逐出,任意搜索,上至屋梁下至柱足,莫不挖掘殆尽……”国民党军队以实际行动将污蔑红军“奸淫烧杀”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。

红军多种形式辟谣

为打破敌人舆论“围剿”,宣传党的革命主张,红军首先是就地印刷、张贴宣传材料,如在贵州省档案馆保存的《保护茅台酒通令》,就是红军针对当时谣言“红军在茅台酒池里洗澡、洗脚”而作出的回应。

除印刷文告外,红军常见的宣传方式还有刷标语、画漫画,现今在广西龙胜县江底乡矮岭村巨石上刻着的标语“红军绝对保护瑶民”,就是针对国民党特务散布的“红军见人就杀,见屋就烧”谣言而写的。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休息时、宿营时、警戒时及短期驻留时,在桥上、墙上、井边甚至国民党县政府,宣传员的标语几乎无处不在。

此外,红军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,如歌谣、舞蹈、戏剧、曲艺等宣传方式。比如歌曲《红军纪律歌》、戏剧《蒋介石骂部下》、舞蹈《工农携手舞》等,在长征沿途曾广泛上演,受到群众热烈欢迎,极大地促进了军民联系和感情。



四川省江油市青林口镇土墙上遗留的红军标语。

敌人被谣言反噬

谣言传久了,有时候散布谣言的敌人反而自己也相信了。以《云南民国日报》为例,1935年4月至6月,国民党地方政府在报纸上反复宣称,“红军衣冠不整,手持土枪、梭镖,只有中央军才服装整齐,武器精良。”

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一个县城时,当地官员队伍整整齐齐、装备精良,误认为是“中央军”而热情款待,连忙办好了粮食等物资筹备工作。到达昆明附近的嵩明城和过官渡时,红军是由当地县长及军警负责人“迎入”的,这是因为红军“纪律、军容远优滇军,此非南京军而谁?因此排队欢迎”,弄得红军将士哭笑不得。陈金星

“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”公益广告



节约粮食积福

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使用公勺公筷
共建文明餐桌



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